

## 国家与市场之间：明代漕粮永折与漕粮货币化

李 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漕粮永折是指朝廷将漕粮永久折银征收。明代漕粮永折是漕粮货币化的标志。其形成与发展历经嘉靖、万历两个阶段。从嘉靖到万历,永折的数额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方式也不断创新,此均表明漕粮货币化趋势呈现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天启之后,漕粮货币化进程中断,其原因与漕粮特殊性有关,即保障京师供给的漕粮在京师仓储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恢复本色缴纳。由此说明漕粮货币化进程受到王朝权力的干预。同时,鉴于漕粮上纳的种种困难,部分有漕州县在永折受阻的情况下,采取了顺应市场机制的新方式,成为漕粮货币化的新途径。明代漕粮永折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深刻反映出漕粮货币化进程,揭示了漕粮货币化的困境,为理解漕运与财政、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明代; 漕粮; 永折; 货币化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5)02-0040-12

##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Permanent Conversion of Grain Transported to the Capital into Silver and the Monetization of Grain for Water Transpor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LI Cheng

(School of Marxism,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Abstract:** The perpetual conversion of grain transport (漕粮永折) refers to the permanent silver-based collection of grain transport taxes by the imperial court. This practice marked the monetization of the grain transport system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ccurred in two stages: the Jiajing and Wanli eras. From the Jiajing to the Wanli period, the amount of perpetual conversion continuously increased, its scope expanded, and innovative methods were adopted, all of which indicate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trend toward monetization of the grain transport system. However, after the Tianqi era, the monetization process was interrupted due to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in transport system—specifically, the necessity of ensuring adequate supplies for the capital when granary reserves were insufficient, which necessitated a return to in-kind payment. Th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monetization process of the grain transport system was subject to intervention by imperial authority. Simultaneously, given the various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payment of grain transport taxes, some regions responsible for grain transport adopted new mechanisms aligned with market principles when perpetual conversion encountered obstacles, thus creating new pathways for the monetization of the grain transport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perpetual grain transport conversion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Ming Dynasty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monetization process of

[收稿日期] 2024-07-21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3批面上项目(2023M73392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创新研究项目(2722023BQ001)

[作者简介] 李成(1991-),历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

the grain transport system, reveals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is process,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ain transport, finance, and the market.

**Key words:** Ming Dynasty; tribute grain; the policy of exchanging tribute grain for silver evolution; monetization

货币化作为明代财政史的核心要素,深入影响了诸如赋役等多个领域的财政运作<sup>①</sup>。在这种趋势下,作为明代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漕粮折银也是白银货币化日益显著背景下必然呈现的现象。较早的研究成果中,因漕粮是田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学者均将漕粮的货币化现象与田赋货币化联系在一起,视其为田赋货币化的内容<sup>②</sup>。随着学界对货币化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又因漕粮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已有学者意识到二者的不同,如丁亮在论述明代田赋纳银化进程时并未将漕粮纳入讨论范围<sup>③</sup>,胡铁球在明代漕粮折价基础上提出了“漕粮货币化”的观点并简要分析漕粮货币化的困境<sup>④</sup>。但总体而言,学界并未对漕粮货币化的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漕粮永折为切入点探讨漕粮货币化问题。所谓漕粮永折,是指漕粮改折永久征收银两<sup>⑤</sup>。一般而言,成化以后漕粮改折由实物变为白银,即说明货币化的特点,如前述学者将漕粮折银视为田赋货币化的表征就是基于这一特点。但此时漕粮折银是暂折,即临时性折银,而对于临时性折银与货币化的关系学界也尚存争议。如有学者认为正统年间的金花银是明代田赋货币化的标志,万明则持不同意见,理由之一即正统年间的金花银属于临时性折银<sup>⑥</sup>。漕粮也是如此,前述丁亮即因漕粮临时性折银的特点而将漕粮排除在田赋纳银化进程之外。所以,探讨明代漕粮货币化问题,断不能忽视漕粮永折。概而言之,成化年间漕粮折银是漕粮货币化发展的趋势,而嘉靖年间漕粮永折的出现,则是漕粮货币化的标志。

目前关于漕粮永折的研究成果较少,如吴滔等强调在争夺永折漕额过程中地方力量的博弈<sup>⑦</sup>,胡铁球论述永折的数额、折价等问题<sup>⑧</sup>,李成探讨朝廷关于永折的分派机制等<sup>⑨</sup>。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漕粮永折的形成与发展趋势来揭示漕粮货币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嘉靖和万历年间是漕粮永折的两个重要阶

① 参见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华书局,2008年;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广陵书社,2016年;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陈锋:《明清变革:国家财政的三大转型》,《江汉论坛》2018年第2期;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日]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伍跃、张学锋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万明:《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② 唐文基:《明代“金花银”和田赋货币化趋势》,《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第164-170页。

③ 丁亮:《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7-19页。

④ 胡铁球:《明代折漕规模及漕粮折价确立原则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⑤ 参见胡铁球:《明代折漕规模及漕粮折价确立原则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李成:《争折:明代湖广永折漕额的分派——以麻城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

⑥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⑦ 吴滔:《明清嘉定的“折漕”过程及其双面效应》,《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徐鹏:《明代江南漕粮改折与地方社会》,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72-280页。

⑧ 胡铁球:《明代折漕规模及漕粮折价确立原则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胡铁球:《明代起运税粮按“领价”折银的原则及其适用范围》,《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⑨ 李成:《争折:明代湖广永折漕额的分派——以麻城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

段,而朝廷是漕粮永折的推动者。同时,结合学界关于货币化起源的争论,探讨漕粮货币化的困境及其背后蕴含的漕运与财政、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为明代货币化研究提供新的案例。

### 一、边粮折银与朝廷施恩:嘉靖年间漕粮永折形成

成化以后,漕粮改折基本以折银为主,但均为临时性改折,改折时间并不固定,短则将漕粮改折一年,长则亦不过数年,到期即恢复本色上纳。弘治以后,漕粮改折临时性特点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向常态化趋势发展。

这一转变与明初边镇粮饷的输纳方式的改变有直接联系。边粮涵盖屯粮、民运粮、月粮等多个方面,漕粮也是其中一部分。边粮中漕粮的主体是从山东、河南海运至蓟州镇的二十四万石漕粮<sup>①</sup>。明中叶以来,边粮征收经历了由征纳本色到以银折纳的变化过程<sup>②</sup>。边镇漕粮作为边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这一时期,边镇较为安定,粮食储备充足,无论是朝廷抑或官兵,均乐于折银,也即时人所言,“蓟镇无大寇,聚兵少,故减米增银犹谓时宜”<sup>③</sup>。这是边镇漕粮得以折银的首要因素。

此外,朝廷利用银钱比价获取漕折之利,也是边镇漕粮折银的重要因素<sup>④</sup>。诚如兵部郎中唐顺之在查理蓟州时所言,“本镇米贱,余价不上四五钱,以为九钱一石征银,又以六钱一石给军,则国与军皆有赢羡”<sup>⑤</sup>,在米价仅四五钱的情况下,漕粮折价九钱,而以官军六钱,其中三钱差价就成为朝廷收入。利用米价和折价的差额,朝廷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在此之前,朝廷已多次重复使用这一方法。如成化二十二年(1486),漕粮折价七钱,官军支取仅二钱五分<sup>⑥</sup>;嘉靖十一年(1532)折价九钱、官军则支取六钱五分<sup>⑦</sup>。

在此背景下,弘治九年(1496),朝廷将二十四万石漕粮中本色和折色分存蓟州和永平,“运本色十万石,赴蓟州仓上纳;折色十四万石,运送永平库收贮”<sup>⑧</sup>,至正德以后,这一情况基本延续下来。直至嘉靖三年(1524),朝廷议定“河南、山东二省秋粮共准折银一十四万石,除四万石照旧每石折银六钱,余皆八钱”<sup>⑨</sup>,折色十四万石成为朝廷定例。

一般来说,以往的改折仅持续数年,而山东、河南漕粮改折,即使最晚从正德年间算起至嘉靖三年,也有十余年。嘉靖三年折色十四万石的规定,使得漕粮改折与以往相比有了重大变化,山东、河南改折开始出现常态化趋势。而且,在此后的文献记载中,朝廷常将十四万石折色视为“旧例”而与其他改折区别开来。直至万历四年(1576),随着官方文献中“永折”一词的出现,山东、河南十四万石改折漕粮被视

① “成化拾贰年,参议李宽题本部覆准,将遮洋运粮量添至贰拾肆万石,照旧蓟州仓上纳。遮洋总原运漕粮叁拾万石,内将贰拾肆万石运蓟州,陆万石运天津,自后定为额”。[明]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18《饷额·蓟州镇·漕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影印明万历十年(1582)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97页。

② 参见梁森泰:《明代“九边”饷中的折银与粮草市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③ 《明世宗实录》卷464,嘉靖三十七年(1558)九月辛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7841页。

④ 参见[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张皓、张升译,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85页。

⑤ [明]唐顺之:《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疏》,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259《唐荆川家藏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359册,影印明崇禎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⑥ 参见《明宪宗实录》卷283,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己丑,第4793页。

⑦ 参见[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27《会计三·漕运》,《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29册,影印明万历内府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3页。

⑧ [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27《会计三·空运》,《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29册,第501页。

⑨ 《明世宗实录》卷44,嘉靖三年十月癸巳,第1135页。



为最早的永折漕额<sup>①</sup>。

继山东、河南改折之后,嘉靖年间湖广改折三万余石,永折的范围开始扩大。嘉靖初,随着湖广安陆卫、荆州左卫卫所性质产生变化,由漕运卫所转变为护陵卫所,相应职责亦随之改变,原本由二卫承运之漕粮得以折银缴纳,“嘉靖五年,令以显陵卫原运湖广正粮二万三千九百三十四石七斗折银,解赴太仓收纳”<sup>②</sup>,嘉靖十九年(1540),“荆州左卫已改显陵卫,原兑湖广、江西正粮万九千八百石乏军领运,乞照安陆卫改折事例,每石折银七钱”<sup>③</sup>。

湖广此次折银的原因,与其为嘉靖皇帝龙兴之地有关。一般而论,卫所职能转变后,该卫所所运漕粮多分派他卫代运<sup>④</sup>,但如果考虑到二卫系嘉靖父母陵寝之护卫,也就不难理解嘉靖皇帝的意图所在。是故隆庆初年时任户部尚书的马森虽强烈反对湖广改折,但最终做出妥协,只强调将二卫所运江西漕粮恢复本色,所言“以湖广之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犹为有说”<sup>⑤</sup>。

值得注意的是,与山东、河南改折在文献中被载为“旧例”相比,官方文献中的湖广漕粮改折的折银常态化特征更加明确。据《漕运议单》记载:“显陵卫原运粮二万三千九百三十四石七斗,嘉靖五年会议题奉圣旨,显陵卫原运粮米以后常年都准折银,解赴太仓收纳。”<sup>⑥</sup>所谓“以后常年都准折银”,显然已是漕粮折银的常态化。

从成化年间漕粮折银开始,至嘉靖年间,山东、河南、湖广三省计有十七万余石漕粮实现常态化折银,也即万历后所言之“永折”。换言之,至嘉靖年间,漕粮改折在临时性改折外出现了新的形式,即永折,此后,漕粮改折也被区分为永折与其他形式的改折,而后者又常被概括为暂折、偶折。

无论永折与暂折,其形式基本是漕粮折银,但二者在改折时间的长短上有着明显区别。暂折改折时间较短,属临时性质,而永折一般是常态化的<sup>⑦</sup>。此外,暂折与永折在折价方面也有不同。暂折折价并不固定,其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常见的灾伤改折,视灾伤轻重而有不同折价,灾重折价低,灾轻折价高;永折折价相对固定,不轻易变更,“国家所藉以充仓庾给军实者,惟此漕粮,乃四百万石之内有改折三十二万余石,其银数当多当少,在议折之日必参互斟酌,至于无可增减而始定名之曰永折,亦以事可经久而无容更议耳”<sup>⑧</sup>。

① 实录中最早记载永折是在万历四年,“陕西道试御史陈荐奏请永折湖广祈阳县漕粮”,而考陈荐呈请原文,有“况山东、河南两省俱荷朝廷坐折七万以示优恤”之说,表明陈荐之请是以山东、河南为参考,换言之,时人默认山东、河南改折是永折。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2,万历四年七月壬寅,第1220页;[明]陈荐:《漕运改折原疏》,乾隆《祁阳县志》卷7《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4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0页。

② [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27《会计三·漕运》,《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29册,第473页。

③ 《明世宗实录》卷236,嘉靖十九年四月壬戌,第4813页。

④ 如成化年间,因荆襄流贼啸聚,“户部奏准湖广荆州等卫存留操守,该运粮分派各卫代运”( [明]杨宏、谢纯:《漕运通志》卷8《漕例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影印明嘉靖七年(1528)刻本,齐鲁书社,1996年,第95页);正德年间“辰濠之乱”,“留南昌军守城,而以该卫二百二十二船分各卫所代运”(乾隆《安福县志》卷4《食货志·漕运》,数字方志馆版本(<http://www.jaszfz.com.cn/news-list-afzhishuku.html>),第197页,参见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3页)。

⑤ [明]马森:《明会计以预图疏》,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298《马恭敏公奏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359册,影印明崇祯刻本,第395页。

⑥ 《漕运议单》(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7册,线装书局,2010年,第507-508页。

⑦ 永折与暂折在时间上的界定,学界存在一定争议,但大体以二十年为界,改折二十年以下为暂折,超过二十年视为永折。参见[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46页;鲍彦邦:《明代漕粮折色的征派方式》,《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⑧ [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15《题覆漕粮永折灾折数日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30册,影印明崇祯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嘉靖年间永折形成,成为漕粮货币化的标志,开启了漕粮货币化的新进程。至湖广折银,永折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表现在地域范围的扩大,更体现在从供给边镇漕粮扩散到供给京师漕粮,而后者又为永折进一步向其他地区扩散提供了可能。

应当注意到,漕粮永折受到边粮以银折纳的趋势影响,可以说是在明代白银货币化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漕粮重本色的背景决定了漕粮货币化进程必然复杂曲折。

## 二、减赋与赈灾:万历年间南直隶有漕州县争折

嘉靖以后,临时性漕粮改折逐渐成为永制,这是漕粮改折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对漕运负担较重的江南地区有着莫大吸引力,但永折与否取决于朝廷。为此,万历年间,以嘉定县为代表的南直隶各有漕州县纷纷呈请永折漕粮,此举不仅扩大了永折范围,也使得漕粮货币化进程出现新的变化<sup>①</sup>。

### (一)“江南重赋”与嘉定永折:嘉定模式的推广

长期以来,江南是学界公认的历史上最突出的重赋区,因而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sup>②</sup>。漕粮是江南重赋的体现,在成化年间确定的400万石漕粮中,南直隶有漕额1791430石,占全国总额的44.78%,几近一半,其中苏州府697000石,占南直隶总额的38.91%、全国总额的17.3%<sup>③</sup>。除漕粮外,还有各项加耗,漕运负担更重,如嘉靖初霍韬即奏称“后以漕运之费,正粮一石,复加耗五斗,是重中又加重也”<sup>④</sup>。

重赋造成了逋赋、逃民等诸多问题,为解决重赋问题,朝廷进行了多次调整,其中以明中叶周忱在江南地区的赋税改革较为成功。在周忱的改革中,折银是重要措施,尤其是金花银的推行<sup>⑤</sup>。金花银的出现,开启了江南田赋货币化的进程<sup>⑥</sup>。

随着田赋货币化趋势的扩大,折银范围逐步由重赋地区扩散到其他地区,由产棉区扩大到种稻区,由官田扩展到民田。直至明中叶,漕粮作为田赋的重要内容也被纳入折银范围。是时,因漕运负担较重,屡有朝臣奏请将江南地区漕粮折银上纳<sup>⑦</sup>。及至万历年间,仍有朝臣奏请漕粮折银,如万历五年(1577),“总理漕储都御史胡执礼言江南改折之利,请每岁会计以改折三分为常,户部覆奏太仓所积仅足支六年,此时未可遽议,上是部言”<sup>⑧</sup>。嘉定县奏请永折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万历十一年(1583),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率先发起永折漕粮之请。嘉定县因“土不宜稻”<sup>⑨</sup>,该县官民一直被漕粮征本色所困。因不产米,要完成本色缴纳,常需要先将棉花换成白银,再用白银买米缴纳,“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以米兑军”<sup>⑩</sup>,这一过程中所费倍增<sup>⑪</sup>。而彼时山东、河南及湖广等有漕

① 关于嘉定等南直隶州县永折,部分学者认为是清初定制,实际上始于明代,清代乃沿袭明制。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04页。

② 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③ 参见[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27《会计三·漕运总数》,《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29册,第482页。

④ [明]霍韬:《嘉靖三劄疏》,霍韬:《渭崖文集》卷1《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25册,影印明万历四年刻本,黄山书社,2016年,第276页。

⑤ 参见朱声敏、范金民:《钱粮博弈:明到清前期江南减赋呼吁及其效果》,《史林》2018年第4期;[日]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伍跃、张学锋等译,2021年,第211-220页。

⑥ 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101-105页;万明:《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研究》,第109、132页。

⑦ 参见赵全鹏:《明代漕运与江南重赋》,《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

⑧ 《明神宗实录》卷68,万历五年十月乙酉,第1473页。

⑨ 《明神宗实录》卷287,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己卯,第5317页。

⑩ 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万历二十一年(1593)本县民本》,刘兆佑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4辑第43册,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498页。

⑪ 如胡铁球指出歇家、地方官等利用市场差价及米色不同的差价在买卖漕粮中获利。参见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7-358页。

省份永折政策的执行,使得永折作为解决不产米的手段进入嘉定士民的视野中。时嘉定县里老以田地“专种木棉”为由,自下而上请求永折,但并未获允,朝廷主要有以下顾虑:

其一,嘉定县折漕数额过多。嘉定县有漕粮 106000 余石,该县士民希望能够将全部漕粮永折,“奏请尽数征银解京”<sup>①</sup>,这一数额已超过现有永折漕额的一半。对于如此规模的漕粮折银,朝廷一方面担心本额有亏,“要于本额之内,亦不容一毫亏损”,另一方面又担心折色逋负,“查各省直地方,一遇改折,便至逋负,与本色者不同”<sup>②</sup>。因此对嘉定县的改折请求,朝廷的态度就显得格外审慎。

其二,与以往改折不同,嘉定县从一开始就援引山东等省成例提出希望将漕粮永折,“且以湖广等处米多粮轻,尚得改折,则本县米少粮重,尤应议改”<sup>③</sup>,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请求已暗含对既有永折政策的挑战。即在永折漕额分派方式上,山东等省是将永折漕额分派至省或府,再由省或府酌情分派<sup>④</sup>。但嘉定县是要求直接将永折漕额分派至县,其分派方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是故针对嘉定县的援例呈请,户部直言“山东、河南每省各折七万石,派之各府,非专一县;湖广先因安陆、荆州二卫改为显陵、承天,改折三万七千余石,又非他邑所得例论者”<sup>⑤</sup>,显示出朝廷在嘉定永折一事上的犹豫。

正是因为数额巨大且试图改变永折政策的分派方式,致使朝廷对嘉定永折的态度始终犹疑不定。最终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之后,朝廷采取了折中措施,即允许嘉定以按年题请的方式提请改折,“但欲暂行数年,似当酌处,如果以时输纳,无亏国课,听其随年题请,如或仍前逋负,致失本额,则又不若起运本色之为便也”<sup>⑥</sup>。此举是因嘉定漕粮数额过大,朝廷为避免漕折银逋负以致原额有亏而采取的防范措施。

直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施行按年题请改折十一年之久后,嘉定县最终获允永折,“以直隶嘉定县土不宜稻,令漕粮永折,每石六钱”<sup>⑦</sup>。

简单来说,嘉定永折是因“土不宜稻”,更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江南重赋”背景下社会矛盾突出,而改折是缓解这一矛盾的重要手段,由此,以折银为主要内容的田赋货币化趋势日益加深,催生了江南漕粮的货币化。

此外,与山东等省永折不同,嘉定县提供了新的永折模式,使得永折在呈请方式上不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施恩,亦有自下而上的呈请,在派分方式上不仅仅聚焦于省、府,更可直接派于县。换言之,漕粮永折原本只是朝廷在特定情况下授予部分有漕省份的有限额度,派分权在各省,但在嘉定获允之后,有漕州县可以主动呈请永折。也因此,在嘉定之后,囿于地方赋役负担的加重等,南直隶各有漕州县竞相效仿,掀起了呈请永折的浪潮。如安东县“乞要将漕粮比授嘉定县事例破格永折”<sup>⑧</sup>;广德州于万历二十三年呈请时,“欲比照嘉定县永远改折事例”<sup>⑨</sup>;在高淳县,“合无将该县正改兑漕粮壹万陆千捌百伍拾石准其永远改折,一如近日嘉定县之例”<sup>⑩</sup>。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万历十一年本县粮塘里老等役通状》,第483页。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部覆》,第494页。

③ 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本县查议》,第486页。

④ 参见李成:《争折:明代湖广永折漕额的分派——以麻城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

⑤ 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部覆》,第495页。

⑥ 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部覆》,第495页。

⑦ 《明神宗实录》卷287,万历二十三年七月己卯,第5317页。

⑧ [明]周案:《题请漕粮永折疏》,雍正《安东县志》卷12《艺文志上·疏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22页。

⑨ 《明神宗实录》卷282,万历二十三年二月丁卯,第5224页。

⑩ 《改折漕粮缘由》,顺治《高淳县志》卷9《赋役考》,《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219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 (二)“被牺牲的‘局部’”:灾赈与漕粮永折

受嘉定县影响,万历十八年(1590),扬州府之兴化县、淮安府之安东县同时呈请漕粮永折。与嘉定按年题请有所不同,二县呈请免于题请,如安东县,“及查嘉定县例……具准改折,今安东弹丸小邑,田淹民窳,比之嘉定尤甚……未免每岁请折,不胜烦瀆,县民屡告永改折色,委应准从”<sup>①</sup>。历经三年艰难呈请,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县先后实现永折。

兴化、安东二县漕粮永折在很大程度上与二县频遭水灾有关。明中叶以来,二县水灾不断。如兴化县“隆庆万历以来迭遭大水”<sup>②</sup>;在安东县,“自罹水患三十年来,地成沙荡,民日流亡,环城内外皆四方流移,鬻贩鱼盐,其土著之民十不存二”<sup>③</sup>,甚至一度有废县之议,“嘉靖以来草湾冲决,海套沙淤,金欲废其县治”<sup>④</sup>。水灾对二县影响极大,诚如给事中张贞观所言:

窃惟自嘉隆以来,河湖无岁不涨决,沿河湖之群邑亦无岁不被其浸没,而淮北之尤苦于河者,则无如淮之安东,淮北之尤苦于湖者,则无如扬之兴化,其当急为变通而难以胶柱者,则无如二邑漕粮之议折。<sup>⑤</sup>

尤值得注意的是,张氏在强调兴化、安东二县水灾尤苦、漕粮当折之外,曾提及自嘉隆以来“河湖无岁不涨”,实际上这才是二县频年水灾的主因,其症结又与明中后期黄淮治理有关。

明中后期,朝廷为保漕运,抑黄河南行,借道汴泗故道,以河济运,黄河夺淮入海,使得江淮地区被灾概率大大增加,水患不断,虽以潘季驯为代表的朝臣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治河措施,但结果则是治水不断而水灾亦不断<sup>⑥</sup>。正是在保运宗旨下,朝廷“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sup>⑦</sup>,江淮一带成为“被牺牲的‘局部’”<sup>⑧</sup>。兴化、安东正是朝廷以河济运下的牺牲品。

在保运目标下,受水患影响的显然不止兴化、安东二县,如果二县永折则极易引起他县效仿。前述张贞观请折时,特意强调“若恐各处仿效成风,则各省府属孰有如二县灾困之极、虚加之粮者,安敢妄为比援”<sup>⑨</sup>。朝廷确实对江淮地区永折审核极严,但也有例外,在兴化、安东获允永折次年,同受黄淮水患影响的泗州呈请永折,并最终获允。

万历二十二年(1594),淮水“暴浸祖陵,泗城淹没”<sup>⑩</sup>,朝臣题请泗州永折,“一万八百余石之漕粮仅折

① [明]周案:《题请漕粮永折疏》,雍正《安东县志》卷12《艺文志上·疏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册,第224-225页。

② 万历《兴化县志》卷3《人事之纪上·附均田本词》,《泰州文献》第1辑第7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③ [明]周案:《题请漕粮永折疏》,雍正《安东县志》卷12《艺文志上·疏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册,第225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407,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月己卯,第7589页。

⑤ [明]张贞观:《条列河防事宜以俾漕务疏》,张贞观:《掖垣谏草》卷3《工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4册,影印明万历刻本,齐鲁出版社,1996年,第533页。

⑥ 明代黄河治理以及江淮地区水灾等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诸如彭安玉:《明清苏北水灾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⑦ 《明史》卷84《河渠二·黄河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8页。

⑧ 参见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生态社会变迁研究(1680—1949)》(修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另关于江北水灾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可参见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陈业新、李东辉:《国计、家业、民生:明代黄淮治理的艰难抉择》,《学术界》2021年第10期。

⑨ [明]张贞观:《条列河防事宜以俾漕务疏》,张贞观:《掖垣谏草》卷3《工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4册,第534页。

⑩ 《明史》卷84《河渠二·黄河下》,第2058页。

至三年而止,则疮痍愈困,苏醒无期,独不可议永免永折,为重灾民起死回生计乎”<sup>①</sup>,朝廷遂有“减折泗州漕粮”<sup>②</sup>的诏令。实际上,泗州自万历以来频遭水患<sup>③</sup>,朝臣亦屡次题请永折,均未获允。此次成功,显然与“暴浸祖陵”有直接关系,也即泗州为明皇室祖陵所在地。祖陵被淹,朝廷被迫改变保运这一首要目标,护陵转而成为首要目标,所谓“上念陵园,中念运道,下念民生”<sup>④</sup>,泗州永折是朝廷在护陵目标下的被迫之举<sup>⑤</sup>。

概而言之,兴化、安东与泗州永折属于朝廷赈灾的措施。更进一步说,漕粮改折常被视为朝廷赈灾的措施之一<sup>⑥</sup>。但灾折多属暂折,当灾情得到控制,漕粮很快恢复本色。而永折显然非朝廷赈灾的常态化举措,同时期江淮地区其他州县曾多次呈请永折,均被朝廷否决,其中代表如泰州,数次呈请均未获允<sup>⑦</sup>。换言之,兴化等县永折,既是朝廷赈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朝廷基于该州县特殊性而给予的偏爱之举。

### 三、易折为本:明末复漕之议与漕粮货币化困境

万历年间南直隶州县呈请永折之后,永折漕额基本确定,至少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朝廷每年例行进行税额统计时,已将永折漕额单独列出,基本形成“是岁原额漕粮\*\*石,内永折\*\*石、灾折\*\*石”<sup>⑧</sup>这一固定表达,是在事实上确立了永折作为漕粮改折的组成部分。但至天启、崇祯年间,朝廷屡有复漕之议。

#### (一)明末朝廷复漕与阻力

至万历中后期,永折漕额基本确定下来,涉及山东、河南、湖广和南直隶四个有漕省份,共计344344.69万石漕粮(表1)。

表1 明代漕粮永折州县及其题准数额、时间 (单位:石/两)

永折时间	地区	漕粮总额	永折数额	折价
弘治初至嘉靖初	山东、河南	山东(兑运280000石、改兑95600石)、河南(兑运270000石、改兑110000石)	100000	0.8
			40000	0.6
嘉靖五年	湖广	250000	23934.7	0.7
嘉靖十九年			13800	
万历二十一年	南直隶扬州府兴化县	32875.9	20000	0.5
万历二十一年	南直隶淮安府安东县	14700	14700	0.7

① [明]林熙春:《陵泗告急敬摺一得疏》,林熙春:《林忠宣公全集·掖垣疏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38册,影印清康熙八年(1669)刻本,黄山书社,2016年,第33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287,万历二十三年七月壬午,第5318页。

③ 参见陈业新:《历史地理视野下的泗州城市水患及其原因探析》,《学术界》2020年第5期。

④ [明]林熙春:《陵泗告急敬摺一得疏》,林熙春:《林忠宣公全集·掖垣疏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38册,第34页。

⑤ 在很长一段时间,护陵与运河是造成明代治河困难的两个因素。参见卢勇:《明代刘天和的治水思想与实践——兼论治黄分流、合流之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⑥ 参见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周致元:《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陈业新:《明代凤阳府灾后税粮折色初探》,《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

⑦ 参见李小庆:《向隅独泣——晚明泰州经济困境与地方应对》,《古代文明》2017年第4期。

⑧ 参见《明神宗实录》卷391,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庚戌,第7393页;《明神宗实录》卷416,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巳,第7865-7866页;《明神宗实录》卷515,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二月壬子,第9721页。



续表1

万历二十二年	南直隶凤阳府泗州	8570.31	8570.3	0.5
万历二十三年	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	106492.69	106492.69	改兑0.6、兑运0.7
万历二十四年(1596)	南直隶应天府高淳县		16850	改兑0.6、兑运0.7
总计			344344.69	

资料来源:[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4《题覆宋仓院漕折定价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29册,第194-197页;[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9《查奏漕粮及永折灾折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29册,第464-469页。

说明:折价是指呈请永折时确定的折价。

在永折漕额既定的情况下,随着天启年间京师粮食储备危机,朝廷始有复漕之议,所谓“天启初,司农告匱,部议复漕”<sup>①</sup>。

应注意到,万历以前官方记载的改折漕额,一般包括永折漕额和暂折漕额。按照胡铁球的统计,永折漕额所占比例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高<sup>②</sup>。至万历以后,一方面朝廷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漕粮折银之弊端也开始显现,诸如赈灾过程中存在的“抑勒亏折”情形<sup>③</sup>。这些都使得朝廷开始逐步减少漕折额度,尤其是暂折漕额逐渐减少。与之相应,永折漕额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至天启以后,永折漕额比例均在70%以上,甚至若干年份占比达90%以上<sup>④</sup>。如此,明末复漕的主要对象即永折漕额。

复漕之举始于天启五年(1625),是年规定,“于五年内暂征本色一年,以补漕额”<sup>⑤</sup>。囿于地方阻力,次年即恢复永折,而“独高淳蒙于溧水等县字面,未得复折”<sup>⑥</sup>。此后,朝廷选择改变策略,将重点转移到提高永折折价上来,在复漕无法施行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提高折价来增加财政收入。

崇祯元年,巡按御史宋师襄提议增加永折折价到七钱,被户部否决,“况定价于昔,几经酌议,而非私为厚薄,沿行于今,历来久远,而难骤为变更,各应照旧征解,庶为妥便”<sup>⑦</sup>。崇祯二年(1629)、三年(1630),在崇祯皇帝先后三次下令彻查永折漕额的压力下,户部终将嘉定县改兑折价由此前六钱提升到七钱<sup>⑧</sup>。

崇祯六年(1633),总理户、工两部的司礼监太监张彝宪再议复漕,“先年改折,初为水旱灾伤权为改

① [明]程嘉燧:《处士朱君墓志铭》,程嘉燧:《耦耕堂集·文卷下》,《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86册,影印清顺治十三年(1656)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② 参见胡铁球:《明代折漕规模及漕粮折价确立原则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③ 参见陈业新:《明代凤阳府灾后税粮折色初探》,《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

④ 依据实录,明末部分年份永折漕额占改折总额的比例分别为:万历三十三年67.25%、三十八年(1610)59.68%、四十一年63.29%,泰昌元年(1620)75.66%,天启元年(1621)60.29%、二年(1626)69.06%、三年(1623)69.06%、五年92.97%、六年(1626)86.74%,崇祯二年99.9%、三年91.62%。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16,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巳,第7865-7866页;卷478,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辛丑,第9024页;卷515,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壬子,第9721页;《明熹宗实录》卷4,泰昌元年十二月壬申,第226页;卷17,天启元年十二月丙申,第895页;卷29,天启二年十二月辛卯,第1492页;卷42,天启三年十二月乙卯,第2225页;卷66,天启五年十二月甲辰,第3165页;卷79,天启六年十二月戊辰,第3867页;[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9《题漕粮永折灾折疏》、《查奏漕粮及永折灾折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29册,第421-423、464-469页。

⑤ [明]张国维:《抚吴草疏》不分卷《高淳改折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9册,影印明崇祯刻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88页。

⑥ 《改折漕粮缘由》,顺治《高淳县志》卷9《赋役考》,《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219册,第103页。

⑦ [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4《题复宋仓院漕折定价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29册,第197页。

⑧ 参见[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15《题覆漕粮永折灾折数目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30册,第23-27页。

折,今以永改,所以仓廩经年不足……为今之谋,在于遵复祖制,开征本色”<sup>①</sup>,其明确将仓储匮乏与改折联系起来,尤其强调永折是仓储匮乏的主因。此议再次引起朝臣反对。户部指出:

但改本为折,定折为永,当时省直吁请,上下斟酌,或未必无苦心,今复易折为本,其间地方之利病、船只之经费、金运之机宜,若非先事熟筹,恐致临时窒碍,徒烦争执。似应飭行各该抚按从长酌议具题,俟年谷顺成,即为议复祖制,以成三年九年之蓄,诚策之善也。<sup>②</sup>

显然,对户部官员而言,复漕之后地方能否按时缴纳本色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常年折银的习惯下,地方不一定具备运输本色的条件。地方抚按的调查成为户部意见的有力支撑。如时任苏松等处巡按御史의祁彪佳就指出嘉定复漕有“五害”,反对复漕<sup>③</sup>。复漕之议遂再次搁置。

此后,朝廷仍采取提高折价的形式缓解财政危机。如崇祯十年(1637),因边境用兵,军费增加,朝廷再次增加折价,“漕粮永折的,每石量增折价,俱依议”<sup>④</sup>。不过,至崇祯末年,财政几近崩溃,朝廷已无暇顾及地方,乃有强行复漕之举。如崇祯十四年(1641),嘉定永折漕额半数复漕,“去年九月,诏书下郡邑,亟复嘉定漕米之半,凡五万三千二百四十六石”<sup>⑤</sup>。又如兴化县,“永折之八千顿令复征本色”<sup>⑥</sup>。

## (二)“抱空腹以待饱于江淮”与漕粮货币化困境

从嘉靖年间永折出现,到万历年间永折范围扩大,均表明漕粮货币化趋势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明末复漕之议,遏制了这一趋势。尽管明末永折得以维系,但提高折价乃至部分州县复漕,也使得永折政策遭到了破坏。永折受阻,漕粮货币化也陷入艰难处境。

朝廷复漕的原因,显然与漕粮的特殊性质有关。于朝廷而言,漕粮主要用于保障京师及边军粮食供给,时人称“国家奠鼎幽燕,京都百万口抱空腹以待饱于江淮灌输之粟,一日不得则饥,三日不得则不知所为命”<sup>⑦</sup>。在岁额既定的情况下,折色与本色此消彼长,而基于漕粮的重要作用,朝廷动态调整折色数额,一般是以京师粮食储备充足与否作为衡量标准:当京师粮储充足时,往往改折数额较多;一旦京师粮储不足,朝廷就会减少折色数额。在这一背景下,改折数额多少往往受到京师粮食储备充足与否的影响<sup>⑧</sup>。如胡铁球指出,明代折漕数额呈现出起伏的趋势,有两个高峰期和两个低谷期,其中改折高峰期,正是京师粮食储备较为充足时期,相反,折漕低谷期则是京师粮食储备不足时期<sup>⑨</sup>。而漕粮永折又是建立在漕粮大规模改折的基础上,永折形成及范围扩大的嘉靖、万历年间,正处在折漕数额的高峰期。

① [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17《覆总理别漕弊飭法纪八款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30册,第129页。

② [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17《覆总理别漕弊飭法纪八款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30册,第130-131页。

③ 参见[明]祁彪佳:《宜焚全稿》卷1《题为严别漕弊申飭法纪以重国储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32册,影印明末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0-202页。

④ [明]张国维:《抚吴草疏》不分卷《高淳改折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9册,第325页。

⑤ [明]侯峒曾:《与朝士论嘉定复漕书》,康熙《嘉定县志》卷20《艺文·书》,《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864页。

⑥ [明]吴牲:《柴庵疏集》卷17《急救疲邑残黎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1册,影印清初刻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666页。

⑦ [明]王在晋:《通漕类编序》,王在晋:《通漕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影印明万历刻本,齐鲁书社,1996年,第242页。

⑧ 实际上,就整个明代社会而言,粮食充足也是折银的前提和基础。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第411页。

⑨ 参见胡铁球:《明代折漕规模及漕粮折价确立原则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而明万历后期以后,京通二仓粮食储备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粮食储备额减少;其二是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sup>①</sup>。鉴于此,朝廷迫切希望减少改折,尤其是占改折总额大多数的永折漕粮,以保障京师粮食供给。

需要指出的是,复漕并不代表朝廷不需要永折银,相反,朝廷对于白银的需求非常迫切,这从不断提高永折漕粮折价就可看出。而之所以屡议复漕,则因永折银逐渐被挪借他用。如天启六年因修建惠王朱常润府邸而挪借江陵县永折银,“本年应解永折尽抵惠工,前后六批可据”<sup>②</sup>。其时朝臣提出的保障财政收入的一系列政策中,保证永折银免于挪借就是其中之一,强调“如永折一项,自应归库支用”<sup>③</sup>。相应地,随着永折银挪用,朝廷不得不用本色弥补亏空,进一步造成仓廩匮乏,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也就是说,基于漕粮供给京师的特性,明末复漕是在京师粮食危机背景下,因永折银两被挪借,朝廷遂采取复漕之举,以保证京师粮食供给。

由此,从明末朝廷复漕和永折受阻,可以发现,漕粮货币化困境的主因在于王朝权力的干预。万明曾从白银货币化的市场驱动机制出发,强调在白银货币化过程中,王朝显然是被削弱而不是被强化了<sup>④</sup>。但就漕粮货币化而言,其货币化进程始终受王朝权力的干预。无论是嘉靖年间永折的形成,抑或万历年间永折范围扩大,其推动因素或因边粮折银,或因皇帝施恩,或因江南减赋,或因赈灾江淮,均是在货币化整体趋势的影响下发生,相应的,朝廷只是在京师粮食储备充足的情况下,顺应这一趋势罢了。一旦京师粮食安全遭到威胁,很快就恢复本色,货币化进程也就难以进行。

除了王朝权力的干预,白银的匮乏也是影响漕粮货币化的因素<sup>⑤</sup>。漕粮永折也受此影响。如隆庆年间,湖广荆州府江陵等县漕粮永折,但一直面临有米无银的困境<sup>⑥</sup>。万历以后,因一条鞭法施行,赋税徭役均征银,用银较多,使得银价较高,进而影响米价,也不利于漕粮折银,时人即称“今兵饷征银,州县一切差徭亦以条鞭法征银,则用银多矣,用银多则米不得不贱”<sup>⑦</sup>,也说明征银日多,白银匮乏,漕粮折银反不如仍征本色,进而影响货币化进程。

### (三)市场驱动:漕粮货币化的新路径

当然,在漕粮“务运本色”的指导原则下,实现永折的有漕州县仍是少数,更多有漕州县仍要运纳本色。但一些客观因素,诸如交通、米色等,使得有漕州县缴纳本色困难,于是就出现了顺应市场机制的“征银买粮”<sup>⑧</sup>。

漕粮收兑中的征银买粮,表现为地方官府直接向民户征银然后集中买粮上纳,或者民众出银通过中介买粮然后缴纳,中间经过或官方或私人将民众的白银转化为官方的漕粮。而不同州县征银的原因则多样。如前述漕粮永折前的嘉定县,“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以米兑军”<sup>⑨</sup>,实际是因该县“土不宜稻”,主要作物是棉花,所以在漕粮征收时期,需要先将棉花织成布匹,再通过布匹贸易换取白银,然后再以银买粮上纳。又如广德州,因州离漕仓所在水阳镇三百里,“议申院道,每米一石,查访丰歉米价,随

① 参见高寿仙:《明代京通二仓述略》,《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10《题江陵漕折已完借用免罚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229册,第511页。

③ 《明熹宗实录》卷76,天启六年九月庚午,第3661-3662页。

④ 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第395-413页。

⑤ 参见[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102页。

⑥ 参见吴滔、[日]佐藤仁史:《嘉定县志:14至20世纪初江南社会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⑦ [明]温纯:《恳乞天恩俯赐议处漕粮以苏运务以拯民困疏》,温纯:《温恭毅集》卷3《疏》,《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第128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1页。

⑧ 参见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杨泉、罗东阳:《明代漕粮收兑中的征银买粮》,《古代文明》2023年第1期。

⑨ 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万历二十一年本县民本》,第498页。



之或征银五六钱或七八钱上下,给发里长,前去芜湖等处买米装载水阳”<sup>①</sup>,是因交通不便,在地方政府默许下,由地方官向民众征银买米上纳。还有浙江,“杭州府属新城、于潜、昌化三县僻居山谷,舟楫不通,转运甚难,向系征银解司,临期给令买米交兑”<sup>②</sup>。类似情形,均表明除朝廷永折外,地方往往通过市场来解决漕粮缴纳问题,由出粮变为出钱,这种形式下,漕粮在市场中实现了货币化,可以看作市场层面的漕粮货币化。

而且,伴随着市场机制的渗透,有漕州县长时间征银买粮之后,就开始不断谋求朝廷永折。如前述广德州,因常需赴芜湖买粮,万历年间该县奏请将漕粮永折,“乞怜一视同仁,援例转申,照徽郡等处改征折色,如解倒悬”<sup>③</sup>。万历年间,河南开封府、河南府、归德府、汝州因距交兑地较远,征银赴交兑地通过歇家买粮,因期间歇家中渔利,与商户沆瀣一气,冠县知县张维新即奏请将三府一州漕粮改折<sup>④</sup>。遗憾的是,有鉴于漕粮的特殊定位,上述呈请很难通过,即使朝廷获允,也多为暂折。

尽管如此,明代中后期,市场始终在漕粮征收过程中发挥作用,除了朝廷的永折外,地方改折也长期存在,并且涉及范围越来越广,直至清代,地方改折影响越来越大,朝廷不得不进行干预,于是在永折之外,又有“民折官办”<sup>⑤</sup>,即民间征银,官方买米。

## 结 语

伴随着明代田赋货币化进程,漕粮货币化趋势在明中叶以后开始出现,而其标志即漕粮永折的出现。成弘直至嘉靖年间,在边粮以银折纳的趋势影响下,边镇漕粮首先开始折银,因边镇安定、本色充足,加之折银之利,使得临时性改折开始成为永制,嘉靖年间山东、河南二省边镇漕粮折银常态化。随后因湖北为嘉靖皇帝龙兴之地,亦因皇帝施恩而将部分漕粮永久折银。山东、河南及湖北这部分永久折银的漕粮是最早永折的漕额。至万历年间,朝廷因江南重赋而推出的折银措施,推动江南地区田赋货币化进程,也催生了江南漕粮货币化,在此背景下,南直隶嘉定县奏请永折,将此前自上而下推行转变为自下而上呈请,形成呈请永折的嘉定模式,为永折范围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开启了有漕州县自下而上争请改折的局面。在此情境下,南直隶兴化、安东、泗州三州县借鉴嘉定模式,以赈灾为由,成功实现漕粮永折。因漕运是以保障京师粮食供给为首要目标,在明末京师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朝廷“易折为本”,永折漕额占据了折漕总额的绝大多数,于是复漕之议遂起,但终因地方阻力,复漕之议被搁置。

漕粮永折的出现及其演变过程,揭示了漕粮货币化的进程与困境。反映出漕粮货币化是受财政体制驱动的,始终在王朝权力的强力干预下发展,其困境在于无法摆脱朝廷的干预。同时,因漕粮永折从征收到贮库均是白银,可以说是财政层面的纳银化,而相应的,更多有漕州县因交通、米色等各种原因,交纳本色困难,于是出现顺应市场机制的征银买粮,利用市场来解决困境,可以称之为市场层面的货币化,成为漕粮货币化发展的新路径。至清代,永折得以继续施行,其覆盖范围基本与明代相同,但市场层面的漕粮货币化快速发展,并产生了诸如包揽、诉讼等种种弊端,朝廷进一步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于是出现诸如“民折官办”等新的政策,直至清末漕粮全部改折。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改折漕粮碑》,光绪《广德州志》卷50《艺文志·表疏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4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23页。

②[明]温纯:《恳乞天恩俯赐议处漕粮以苏运务以拯民困疏》,温纯:《温恭毅集》卷3《疏》,《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第1288册,第432页。

③《改折漕粮碑》,光绪《广德州志》卷50《艺文志·表疏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42册,第723页。

④参见杨泉、罗东阳:《明代漕粮收兑中的征银买粮》,《古代文明》2023年第1期。

⑤参见吴琦、何晨:《清代漕粮的“民折官办”——兼论清代政策变通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